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学术自传



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卷、哲学学部卷
(下)

周溯源 赵剑英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学术自传

陳奎元印

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卷、哲学学部卷
(下)

周溯源 赵剑英 主编

下册目录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文哲学部卷(下)

- 张 炯：从战士到著名学者和作家 / 463
- 陈铁民：我的学术研究之路 / 507
- 陈筠泉：愿为哲学研究事业繁荣献年华 / 525
- 邵荣芬：回望语言学研究之路 / 545
- 卓新平：徜徉在人的精神世界 / 555
- 罗希文：精勤不倦三十载 矢志不渝铸鸿篇 / 577
- 金宜久：从哲学迈入宗教和政治 / 597
- 郎 樱：从书斋走向田野
——我的新疆情结 / 631
- 柳鸣九：柳鸣九先生的外国文学研究之路 / 645
- 侯精一：漫漫五十载 弹指一挥间 / 669
- 姚介厚：回眸治学之途 / 693
- 钱中文：跋涉的欣悦 / 719
- 徐崇温：学术领域跋涉六十载 / 751
- 高 莽：艰苦的道路 / 773

郭宏安：三驾马车永远在路上 / 795

黄长著：从语言学到图书馆学情报学：成长中的转折 / 839

黄宝生：跋涉在梵学之路 / 867

梁存秀：上溯到德国古典哲学 / 883

朝戈金：孜孜矻矻问业 转益多师求学 / 903

魏道儒：我的佛教学术研究历程 / 919

后 记 / 937

哲学部卷（下）



张 炯

Zhang Jiong

男，汉族，1933年11月出生，1948年10月参加革命，曾为闽浙赣边区人民游击队二纵三支队政委和第十兵团司令部机关干部。1955年进北京大学学习，1960年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6年10月到《红旗》杂志社，任文化组负责人；1979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文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并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第六届副主席，2006年离休后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并兼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名誉院长、特聘教授和多所大学客座教授，还长期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中国文学专家组组长。此外，还担任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等多个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著有评论集《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文学的攀登与选择》《走向世纪之交》《文学的回眸与思考》等8本；专著有《新时期文学格局》《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

《先进文化与当代文学》《论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文学透视学》等10种；主编有《新中国文学50年》《新中国文学史》《中华文学发展史》《共和国文学60年》《中国文学通史（12卷）》《中国文学通典（4卷）》《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丛书（12卷）》等。多次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最佳著作奖、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鲁迅文学奖各一次。获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的20世纪成就奖。2011年出版《张炯文存》10卷。

从战士到著名学者和作家

—

1933年11月，我生于上海。因母亲生病，我三个月大时就被外婆携回福建老家。幼年，便随她住外祖家——福安县桥溪村，并就读国民学校。那是个秀丽的乡村，青山环绕，碧水长流。虽然离县城30里路，外祖家却有许多藏书。书橱里不但有《左传》《昭明文选》《古文观止》《三国演义》以及鲁迅、冰心、丁玲、王鲁彦等作家的选集，甚至还有线装书《二十四史》、《世界地图集》和《中国地图集》。这些书使我知道了中国历史上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有些书，特别是文学作品，我读得如醉如痴，废寝忘餐，它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兴趣。

我读的初中也在乡间，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从闽东北的大港湾——三都澳搬来的，叫省立三都中学。那时我妈妈担任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她带我就住在图书馆里。所以，我在课余有机会总躲在书库里，从书架上翻阅各种书籍。读得最多的便是小说，武侠小说更喜欢读。但那时我兴趣广泛，不曾想将来朝着文学方面发展。

1947年，学校搬回三都岛。那年我考了第一名，被同学选为

学生自治会主席，因领导同学罢课，被学校开除。1948 年秋，我从家乡来到省城福州，又以第一名考进英国教会办的三一中学高中部。当时目睹了旧社会的黑暗，由于接触到进步同学和革命书籍，不久便信仰共产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闽浙赣区党委福州城市工作部的高农支部，并参加编辑地下秘密刊物《骆驼》。刊物每月一期，政治、经济、时事和文学的稿子都有，由编辑自己刻蜡版，自己印刷和发行。我在主编林士锋的领导下，在进步同学间秘密发行和传阅这份刊物，也写一点稿子。我最早发表的一篇文学批评文章，于 1948 年 12 月发表在《骆驼》上，评的是苏联作家安特莱耶夫的小说《表》。当时地下党主要工作是搞学生运动。后来，我再次被同学选为学生会主席，参与领导 1949 年年初福州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假和平真内战的游行示威。1949 年 4 月初，又受命与同一支部的林友川、林士锋去闽东北白云山地区开展人民革命武装起义，打游击，直到 1949 年 8 月初与南下的解放大军会师。会师后随大部队解放福州。在部队的六年，我多在机关工作，也读了不少文学书。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还有苏联作家的小说几十部。可以说这多少打下了我学文学的根底。

二

1955 年，我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初进燕园和未名湖，我感到如入天堂，立即被那美丽的校园和巍峨壮丽的楼舍所震撼！原想将来当个作家，所以，1956 年学校办了个文学刊物《红楼》，我便向它投稿。红楼是原北京大学屹立于城里沙滩的老校舍。那

里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红楼》第一期将我的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作为首篇发表了，没想到在校园颇为轰动，刊物行销达四千册。我因此也被聘为《红楼》的编辑。50年后，北大百年校庆，编辑了一本纪念文集《北大风》，还把《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篇小说收辑在里面，与胡适、俞平伯等名家的作品排在一起，这是我当年料想不到的。后来我又写了《重逢》《蓝豹子》等小说，还写有一些诗歌和散文，也在《红楼》发表，有的曾被《萌芽》和《解放军文艺》转载。当时在《红楼》编辑部工作的还有康式昭、谢冕、江枫、林昭、张元勋、杜文堂、王克武、马嘶、刘登翰等。1956年5月4日，我和谢冕、江枫、林昭、刘登翰等还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缅怀革命先烈，然后沿着当年“五四”游行的路线，从东交民巷走到赵家楼的曹汝霖公馆，并一起拍照纪念。没有想到，当月19日张元勋、沈泽宜贴出一首诗《是时候了》，号召帮助党整风，掀起了全校大字报高潮，后来被定性为“向党进攻的第一枪”。在“反右”扩大化中，张元勋、林昭都被打成“右派”。我因一时认识跟不上，虽然也反对错误言论，却不认为有言论错误的学生是“敌人”，被斥为“右倾”，受了“党内警告”的处分，直到1978年才被平反而撤销处分。林昭表面上是个柔弱的女性，却因顽强坚持自己的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王洪文下令枪决，其刚烈性格实在令人景仰！1958年，《红楼》改为《北大青年》，编辑部大改组，我也就离开了。

我的文学创作势头被1958年的“大跃进”打断了。学校提出生产劳动与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方针。我和同学们曾到十三陵修建水库大坝，到首都钢铁公司炼过钢，还到平谷和密云县农村深翻土地、帮助秋收。学校还提出批判白专道路，提倡又红又专，

还动员学生批判老师教学中的所谓“资产阶级观点”。正巧我又被选为年级学生会主席，党支部要我召集全年级同学讨论我们该怎么办？大家认为，与其去批判老师的观点，还不如利用暑假期间我们自己写一部学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文学史。当时决定下来，便成立个编委会，并推举党支部书记费振刚和我任正、副主编，与谢冕、闫国忠、张少康、孙静等同学，组成编委会。同学们除了白天忙乎，晚上也挑灯夜战。人民文学出版社听说后，决定要出版我们的书，派黄肃秋和舒芜当责任编辑。我们奋战了36天，这部两卷本的红皮《中国文学史》居然出版了。陈毅元帅还写信表示祝贺！各大媒体对这部学生编写的文学史更是做了广泛的报道。但由于我们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存在理解片面和简单化倾向，1959年何其芳和周扬同志对此曾提出善意批评。我们也觉得他们的批评有道理，所以，决定重写这部文学史，并请系主任杨晦先生和教授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冯钟芸、陈贻焮等先生参加编委会，帮助我们审稿把关。这就是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12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这两套文学史均署“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集体编著”。在这两套书编写过程中，我除了参与近代文学部分的撰写和全书的审稿、改稿外，全书的“绪论”和“结束语”也是我起草的。几位老教授都提过修改的意见，使我得益良多。后来，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被教育部颁布为“大学文科教材”。我们年级还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可以说，这个工作初步锻炼了我从事学术研究和组织集体科研的能力。我们毕业时，任继愈教授和他的夫人冯钟芸教授还特意请我们编委会的几位同学到京郊香山饭店吃了顿饭和漫步游玩，表示奖励之意！那时的师生关系非常融洽。

三

在大学的最后两年，我还受命担任北大文学创作组组长。当时参加创作组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温小钰、孙幼军、任彦芳、杨匡满和古典文学学者陶文鹏、裴效维等。我们集体创作过一部多幕话剧《新兵新传》，并在校内演出。全剧反映1955级同学集体编书的事迹。这使我对剧本的结构艺术初有体会。后来又受命与任彦芳、张时鲁等去创作一部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剧本，可惜毕业前没能完成。但我与任彦芳访问了许多“五四”时代的风云人物。其中著名的就有许德珩、刘清扬、刘仁静、罗章龙、朱谦之、杨晦等，他们在“五四”时期的爱国热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受到非常有益的教育和熏陶！

大学毕业时，我还没有打消当作家的梦。可是，分配工作的时候，党支部却宣布我分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我只好与同学王水照、吕薇芬、谭家健、张毓茂、李汉秋等十多人来到中国科学院文学所。记得同时分配到文学所的还有来自复旦大学和从莫斯科大学等留学归来的各十人。一时没有地方住，就把文学所六号楼的澡堂铺上板子，让我们挤着住。后来才搬到八号楼集体宿舍。当时文学所名家荟萃。钱锺书、俞平伯、王伯祥、余冠英、季羡林、蔡仪、唐弢、戈宝权、卞之琳、杨绛等老一辈学者都在，年轻的还有邓绍基、刘世德、蒋和森、樊骏、曹道衡、钱中文、吴元迈、涂武生等。我先被分配到美学家蔡仪当组长的文艺理论组（后来改叫研究室），参加他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所里指定蔡仪先生做我的导师。文学研究虽然与我的兴趣不合，

但那时大家组织观念都很强，我也只好服从组织分配了。

不久，《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历史剧《甲午海战》，我也被邀发了言。当时红学家蒋和森的夫人张晓翠在《文学评论》任编辑，她叫我把发言写成一篇文章。我花了一整天，写成一万字的文章，题为《评〈甲午海战〉兼论历史剧》，文章被采用了。但过两天给我看的清样，却只剩下七八千字。我不大高兴，去找张晓翠。她说，这是何其芳同志亲自删改的。你如果有意见，可到他家里去找他。我那时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便贸然去到何家。进门后才知道何先生有病发烧，躺在床上。他见我进门，立即从床上起来，把我引到书桌前，说：“晓翠同志打电话来讲，你对文章的删节有意见，你说说看。”接着他拿出原稿，一段一段地指给我看，说明他删改的理由。他以平等态度待我，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还说，如果我实在有意见，也可以恢复一些段落。他特别说：“你不能把《甲午海战》跟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比，席勒的剧本是世界名著。你写作品评论一定要有比较。要读许多世界名著，才能很好进行比较。就像你要看过好多世界级的乒乓球比赛，你才能真正比较出乒乓球打得好坏。”病中的他的诚恳态度使我非常感动。何其芳同志当时不仅是著名的诗人，还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和古典文学研究家。我对自己打扰他养病，深感抱歉！而他那平易近人和提携后进的热情，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蔡仪先生学风的严谨，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刚进文学研究所，学习《毛泽东选集》要写一篇学习心得。党支部书记王平凡同志要我把自己写的稿子拿去向蔡仪先生请教。蔡先生第二天把稿子退给我时，在3000字的稿旁竟提了18条意见。有的涉及语句逻辑，有的涉及内容的欠严密。他认真和科学的态度不能不

叫我感动！在跟蔡先生从事《文学概论》写作的三年中，不仅蔡先生对我有许多教诲，从一起工作的同事那里我也学到许多东西。那时参加编写《文学概论》的，有北京大学的吕德申、胡经之，中山大学的楼棲，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树谦，武汉大学何国瑞，山东大学的吕惠娟和文学所的柳鸣九、李传龙、王善忠、张国民、王淑秧等。他们有的是我的师长，有的虽是同事，也都学有专长。

四

我当时担任《文学概论》编委会秘书，这不但使我有机会参加编委会的讨论，还有机会参加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主持的、有全国许多学术权威参加的讨论会。那时，林默涵、何其芳、王朝闻、毛星、叶以群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都参加过这样的会议，文学研究界老一辈的学者郭绍虞、朱光潜、王季思、唐弢、冯至、杨晦等著名教授也参会。周扬在会上做了多次讲话，在场作记录的就是我。会上对《文学概论》的提纲有过多次争论。周扬一再强调，《文艺概论》的编写要反映文学的本质规律、构成规律、发展规律、创作规律和批评欣赏规律，还强调，要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多引用历史上的名家和权威的见解。他曾被人认为一向很“左”。但这段时间的讲话却说明他并非任何时候都“左”，而是相当清醒，富有历史的洞察力。有一次在前门饭店开会，他来得比较早，见会议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便同我聊起来。他知道我参加过北大文学史的编写，就说，你们不但应该努力做个学者，还要努力做个战士！有一次他到中央党校看望编写组，跟我们年轻同志座谈

说：“你们要多读书！我们这代人因革命工作占去很多时间，就没有鲁迅、郭沫若那一代人读的书多。现在陈毅同志提出应该恢复学位制。你们应该争取做博士。”那时周扬还兼任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威望很高，虽年近花甲，却面色红润、思维清晰、才华焕发、谈笑风生。他的谈话，给我很大的影响。

在中央党校编写《文学概论》近三年，我确实读了一些书。1963年9月，根据中央的部署，在何其芳所长的率领下，我与文学研究所的许多同志，到安徽农村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还做了一年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公社党委委员。后来何其芳又派我带领一批同志到通县农村搞试点，摸索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1966年，又派我协助蔡仪先生带领工作队到门头沟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担任工作队副队长。正准备进村，“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样，十多年间便基本上与读书无缘，从做学者的角度看，这真是我的不幸了！

五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北京的一个政治旋涡，后来更被视为所谓“‘五一六’分子的大本营”。

我只参加了一年“文化大革命”，被群众组织调去担任一个小报的编辑组长。组内的同事有张卓元、王家福、陈启能、郭冬乐、张琢、李惠国等。那时，他们被视为各研究所的才俊。到80年代，他们都成了所在研究所的所长或副所长等领导。从他们那里，我也得益匪浅。

1967年秋，我对“文化大革命”渐有看法，便不再参加群

众组织，成了“逍遥”派。1969年秋，我被视为“‘五一六’嫌疑分子”而遭隔离审查，并被禁于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一间农村小屋。197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让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全部回到北京。开始，我仍然被关在文学所6号楼上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有个专案组的同志被派来“陪住”，但允许我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那时我就把《毛泽东选集》和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读了一遍。到1975年春才被宣布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解放。当时正值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哲学社会科学部派来以林修德、宋一平、刘仰峤同志为首的新领导，准备恢复业务工作。文学所也成立了以朱寨同志为总支书记的领导班子，何其芳也被选为总支委员。何其芳提出要恢复出版《文学评论》，并成立了编辑部核心领导小组，以他为组长，毛星为副组长，邓绍基、蔡葵和我为成员。邓兼古代文学组组长，蔡兼理论组组长，我兼现代文学组组长。学部的新领导也把原来就有的《新建设》杂志改为《思想战线》，积极筹划出刊。可是，由于“四人帮”一伙的干扰，终未能出版。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姚文元所控制的《红旗》杂志要改组，中央下令从哲学社会科学部调人进驻杂志社，我也在被调之列。带队的是《思想战线》主编邢方群，文学所同去的还有刘再复、杜书瀛、谭家健、陈素琰等。原《红旗》编辑部的编辑仍在工作的只有苏星、何望贤等少数几位。不久，外交部副部长王殊同志调来《红旗》当总编辑，让我和何望贤担任编辑部文化组负责人。

1976年11月，我奉《红旗》领导之命，与谭家健同志一起去四川了解文艺界的情况。到成都后，我们到省委宣传部，见到常务副部长马识途同志。他是老革命，也是文艺界知名作家。他很快就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成都文艺界的座谈会。沙汀、艾芜等许